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美國月刊第七卷第二期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二月

# 美國在「單極為主多極政經體系」中的 新地位與新挑戰

陳一新

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副教授

陳一新（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副教授）

# 美國在「單極爲主多極 政經體系」中的新地位與 新挑戰

## 提 要

後冷戰時期中，國際政經體系由「非常鬆弛兩種體系」轉型爲「單極爲主多極體系」。在此一體系中，美國以獨強姿態出現，享有無可爭辯與受尊敬的領導地位，但也面臨許多新的挑戰，若不能妥爲因應善加處理，也可能促成此一體系進一步轉化。

隨著冷戰結束、東歐共產主義崩潰、德國統一、波灣戰爭導致蘇聯自超強除名、流產政變、崩解、成立「獨立國家協」、裁軍談判、區域和解、日本、德國分別成爲亞洲與歐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全球塊狀經濟的整合或合作，以及經貿與科技的掛帥，國際政經體系（註一）也由國際政治學者凱普蘭（Morton A. Kaplan）所描述的「非常鬆弛兩極體系」（the very loose bipolar system）朝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教授所說的「單極爲主多極體系」（the unimultipolar system）的方向發展。（註二）美國在此一新的國際政經體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但也面臨新的挑战。

### 「鬆弛兩極體系」與「均勢體系」的混合國際政經體系（一九四八—一九七五）

從冷戰開始到美、蘇兩大超強爲主形成的東西兩大集團對峙，以迄越戰結束的這段期間，可稱之爲「鬆弛兩極體系」、「均勢體系」（the "balance of power" system）與國際經濟體系（the international econom-

ic system）的混合國際政經體系。（註三）此一混合體系包含以下七項分別對不同角色適用的「基本規則」（the essential rules）：（註四）

（一）允許戰敗或受到壓制的基本成員國成爲可接受的夥伴重新加入體系。例如，美國允許日本、西德加入西方與反共國家爲主的政、經、軍體系，蘇聯允許東德加入東方（馬列社會主義國家爲主）的政、經、軍體系。

（二）每個集團都想比敵對集團增加更多的力量。能藉談判增加力量就不發動戰爭，但當談判無效時，則不惜發動戰爭，以增加自己的力量或至少減少自己的損失。例如蘇聯藉限武談判擴充軍備，美國常獨立扮演「世界警察」（the world police）的角色，另美、蘇也常在各地進行代理戰爭。

（三）儘管每個集團都表示寧可捲入大規模戰爭，也不容敵對集團在力量上取得優勢，但實際上均避免發動或引起大規模戰爭，而僅進行有限戰爭（the limited war），例如韓戰、越戰等。

（四）每個集團中的領導國家不僅試圖將其本國目標推廣到集團中的所有成員國，也試圖推廣到敵對集團中的所有成員。例如，美國試圖將和平、自由、繁榮等目標

推廣到集團中的西方與反共國家。在這段期間，惟除西方國家與少數反共國家之外，效果大多不彰。至於美國試圖將其目標推廣到蘇聯為首的東方集團成員國則更是乏善可陳。倒是蘇聯在這段期間推廣其本國目標的效果較為顯著。

(五) 每個集團中的領導國家均試圖擴大本集團成員國的數目，但對那些可能加入敵對集團的非集團國家，則允許它們保持中立或維持非集團成員的地位。例如，芬蘭、奧地利在兩大集團之間保持中立，不結盟國家則自成一勢力。

(六) 全球性角色試圖減少集團之間的不相容性，並試圖動員與其目標一致的國家共同抵制訴諸武力之類的嚴重越軌行為。例如，聯合國在朝鮮半島與其他衝突地區所作的努力。不過，除了在朝鮮半島收到較大效果之外，其餘泰半徒勞無功或收效甚微。

(七) 全球經貿體系可概括分為：(1) 東西方各自「獨立」的經貿關係；(2) 南方「依賴」北方的經貿關係；(3) 西方「相互依存」的經貿關係。

不過，此一「鬆弛兩極體系」與「均勢體系」的混合國際政經體系到七〇年代中期以前已如強弩之末，難

以為繼，而在七〇年代中期以後轉化為「非常鬆弛兩極體系」了。國際政經體系的變化，主要是「角色分類變項」(the actor classificatory variables)、  
「能力變項」(the capability variables)與「信息變項」(the information variables) (註五)或一些因素的刺激、產生交互作用而造成。這些因素包括：

(1) 美國以「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援助西歐復興並援助日本，使法國、西德、日本從戰後廢墟中重新崛起於世界舞台；

(2) 美國採取「圍堵」(the containment)戰略一方面扶助與蘇聯為首東方集團接壤或鄰近的國家，防堵共產主義思想的擴散，一方面更以龐大的傳統武力與提供核子傘的方式遏阻共產國家勢力的蔓延，並對反共國家提供軍經援助，雖然收效甚宏，但也形成美國嚴重財政負擔；

(3) 美國常獨力扮演「世界警察」角色，造成國力嚴重耗損；

(4) 美國在海外軍事部署與基地，不僅使國防開支不斷增加，也常導致反美情緒高漲；

(5) 美蘇軍備競賽造成兩敗俱傷，限武談判則爾虞我

詐；

(6) 美國越戰期間反戰氣氛甚囂塵上，造成美國價值觀的失落，及至越戰失利，退出中南半島，復導致美國民眾抱持「內向」(introversion)的心理；

(7) 日本、西歐國家（特別是法國與西德）逐漸在全球市場成爲美國的競爭對手；

(8) 美國在自由貿易原則下對全球民主與反共國家開放市場；

(9) 聯合國因否決權的濫用與第三世界的把持而功能不彰；

(10) 中蘇共由意識形態之爭演變成共產世界領導權之爭，造成共產集團一分爲二；

(11) 東歐從戰後成爲蘇聯的「資產」逐漸發展成蘇聯的「負債」。另東歐政潮、學潮、工潮不斷，也迫使蘇聯必須以武力鎮壓，而愈來愈難以駕馭；

(12) 蘇聯忙於在第三世界擴張勢力，中共則忙於防備北疆的威脅與文化大革命，造成國力的浪費。

其中，(1)、(2)、(4)、(7)、(8)、(9)、(11)、(12)造成「角色分類變項」起化學作用，(1)、(2)、(3)、(4)、(5)、(6)、(7)、(8)、(9)、(11)、(12)與「能力變項」有關，至於(3)、(5)

則多少涉及「信息變項」。

從以上的討論中，可以歸納出此一期間國際政經體系變動的「轉化規則」(the transformation rules)。(註六)

(一) 轉化規則與原體系內的特定「基本規則」有密切關係，例如允許戰敗或受到壓抑的基本成員國成爲可接受的夥伴重新加入體系，復因爲美國大量援助日本、西歐國家並助其發展經濟，使日本與西歐盟國逐漸崛起。又由於每個集團都想比敵對集團增加更多力量，再加上不斷的軍備競賽、代理戰爭、有限戰爭以及對外擴張，終於導致美、蘇兩大超強國力的耗損。而集團中的領導國家無不試圖將其本國目標推廣到集團與敵對集團的成員國，也使美、蘇兩大超強大量透支國力，特別是美國無限制開放市場，更使自身逐漸限入經濟困境。

(二) 國際政經體系的轉化會受到一些因素的刺激，而使速度加快。前述(1)至(12)因素就是引起原體系變動的主要因素，而可分別歸類爲「角色分類變項」、「能力變項」與「信息變項」。

(三) 由於這些因素或變項的交互作用，導致日本、西歐的崛起，美、蘇兩大超強相對衰退，對兩大集團主要

成員國的控制力與影響力日低；因此，在七〇年代中期以後，國際政經體系遂朝向「非常鬆弛兩極體系」發展。

#### 「非常鬆弛兩極體系」（一九七六—一九八八）

越戰之後以迄一九八八年左右，國際政經體系走向「非常鬆弛兩極體系」，此一體系含有以下十二項分別對不同角色適用的「基本規則」：（註七）

（一）每個集團的領導國家對於各自各集團內成員國的影響力的逐漸減弱。例如，美國必須好話說盡才說服西歐盟國部署潘興二式中程飛彈。蘇聯戈巴契夫主政之後即便對東歐國家施加壓力，要求其改革開放，但也無法完全達到目的。

（二）每個集團的領導國家與集團內的主要成員國在集團政策上出現歧見，甚至分道揚鑣。例如，美、日貿易開始出現嚴重失衡問題。西歐各國不顧美國反對，決定敷設蘇聯到西歐的瓦斯輸送管。羅馬尼亞在外交上採取較為獨立的路線。

（三）每個集團的領導國家必須藉助溝通、協調的方

式，與各自集團內的主要成員國達成協議，解決某些危機。例如，美國尋求日本、西德協助才解決美元大幅下跌的危機，蘇聯必須與東歐國家協調，達成能源分配、共渡能源危機。

（四）集團之間的界限變得較前更為模糊，甚至同一集團內的成員國也出現戰爭。例如，原屬於東方集團的中共反而更為擔心來自蘇聯的威脅，而與美、日、西歐形成鬆弛反蘇聯盟。中共對越南發動懲越戰爭；英國為福克蘭島遠征阿根廷。

（五）每個集團的領導國家不僅開始更為認真地展開裁軍談判，也逐漸瞭解彼此之間存在共同利益。例如，美、蘇在八〇年代中期以後展開的裁減核武談判，就因為談到查證問題，而顯得更具誠意。而八〇年代中期以後，美、蘇雙方也發現結束阿富汗戰爭、和平解決柬埔寨問題合乎雙方的利益。

（六）游擊戰爭與「次有限戰爭」（the sublimited war）逐漸取代「代理戰爭」與「有限戰爭」成為這段期間的主要戰爭形態。戰爭的主要原因，也不限於集團領導國家之間的競爭。例如，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安哥拉、兩伊戰爭、美軍攻占格瑞納達、美軍轟炸利比亞

等雖與美、蘇競爭不無關係，但前三者更可稱之為游擊戰爭。除兩伊戰爭仍可稱之為有限戰爭外，後二者的規模也較有限戰爭為小，而可稱為「次有限戰爭」。

(七)每個集團的領導國家均傾向較前更為自制，避免發生大型戰爭。

(八)由於國際性合作過程中的「外溢」(spill-over)效果彰顯，因此國際性整合有進一步擴大之勢，並開始在全球產生連鎖反應。例如，「歐洲煤鋼共同體」的運作成功，導致「歐洲共同市場」的出現，進而朝向「歐洲單一市場」邁進。歐洲的經濟整合也開始刺激美國籌組「北美自由貿易區」。(註八)

(九)每個集團的領導國家均陷入經濟困境，而採取不同的因應策略。例如，美國提出「自由與公平貿易」(free and fair trade)的政策取代原先的「自由貿易」。蘇聯在八〇年代中期後則致力改革與開放，鼓勵東歐國家跟進，並在國際上採取「新思維」的外交政策，期望西方國家對其經濟改革伸出援手。

(十)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全球塊狀經濟體的逐漸浮現，以及共產世界的改革風，使得全球經貿體系中東西方「各自獨立」的經貿關係轉變為東方「依賴」西方的

經貿關係，而原先西方「相互依存」的經貿關係也發展為「既合作又競爭」的經貿關係。至於南方「依賴」北方的經貿關係在這段期間則仍大致保持不變。

(十一)由於經濟與貿易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扮演全球性角色的機構逐漸增加。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亞洲開發銀行」與「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的地位與重要性均較前一時期更高。

(十二)傳統的全球性角色試圖以更有力的姿態出面解決國際衝突，例如，聯合國試圖解決中東問題。

不過，由於在這段期間一些因素的影響與交互作用，「非常鬆弛兩極體系」從一九八九年開始轉型，而朝向「單極為主多極體系」發展。這些因素包括：

(1)美國發展「戰略防禦主動」(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計畫，蘇聯無力抗衡，被迫採取更為配合與妥協的政策。

(2)雷根政府使美國重新站起來的龐大建軍國防預算、減稅政策、大量舉債等舉措，以及高工資、低儲蓄、高社會福利與低度海外市場競爭能力的經貿結構，不僅造成嚴重的雙項赤字，也使美國由戰後的債權國淪落為債務國。

(3) 蘇聯計畫式經濟早呈敗象，入侵阿富汗之後，國力更是大量耗損，經濟病入膏肓，沈疴難起。

(4) 戈巴契夫主政後推動改革、開放，部分東歐各國在莫斯科壓力下跟進；惟經改在蘇聯與東歐並不順利，政治改革對其中某些國家而言，則未見「利」，先見其「弊」。

(5) 日本開始不滿意其經貿力量與國際地位之間的落差，而美國也希望日本在國際舞台上扮演更活躍的角色。

(6) 東歐的改革為德國的統一帶來希望。

(7) 部分開發中國家在經貿發展展現活力，例如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使國際上出現新興工業國家，在全球經貿體系中成爲不可忽視的力量。

(8) 民主化逐漸成爲世界潮流，如巴基斯坦、菲律賓、南韓、中華民國等。

(9) 經貿力量日益抬頭，意識形態影響力則漸趨式微。

(10) 和解蔚然成風，不僅見於美、蘇之間，也見於東、西德，甚至連台海兩岸也展開交流。

其中，(1)、(2)、(3)、(4)、(5)、(6)、(7)、(8)可列

爲「角色分類變項」；(1)、(2)、(3)、(5)、(6)、(7)、(9)與「能力變項」有關；(1)、(2)、(3)、(4)、(8)、(9)、(10)則多少涉及「信息變項」。這些因素又可歸納出此一期間國際政經體系演變的「轉化規則」：

(一) 轉化規則與原系統內的特定「基本規則」關係密切，例如，每個集團的領導國家對集團成員國影響方式微或出現歧見，而必須藉溝通與協調才有可能取得集團成員國的合作與支持，就顯示出一種近似多極的體系正在逐漸浮現，並爲未來各種之間的交往提供參考模式。

(二) 國際政經體系的轉化會受到一些因素的刺激，而使速度加快。前述(1)至(10)項因素就是引起原體系變動的重要因素，而可分別歸類爲「角色分類變項」、「能力變項」與「信息變項」。

(三) 這些因素或變項的交互作用，導致美、蘇兩大超強進一步相對衰退，日本與西歐角色的進一步提升，以及新興工業國家的崛起，惟由於美國雖然相對衰退但國力尚在，且無任何一國有能力取而代之，而蘇聯卻日薄西山；因此，一九八八年以後的國際政經體系就朝向「單極爲主多極體系」的方向發展了。

## 美國在「單極為主多極政經體系」（一九八九—）中的新地位

一九八九年以後，國際政經體系朝向「單極為主多極體系」發展，此一體系含有十三項分別對不同角色適用的「基本原則」。

首先，原體系內的某一集團徹底解體，另一集團因為對立狀態不再存在也出現打散、改組或虛形化的情況。例如，由於東歐社會主義旗幟易色，原體系為中的東方集團遂遭致解體的命運，西方集團則面對是否再有緊密結合必要的問題。

其次，原體系內某一集團的領導國家由式微而崩解，另一集團的領導國家在並無一國取而代之的情況下遂以獨強姿態出現。波灣戰爭後，前蘇聯自超強除名，美國雖然相對衰退，但至少在其他國家眼中成為「勢將領導」(bound to lead)的角色。

第三、獨強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再獨自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而以與盟國或其他國家進行諮商與合作的方式處理區域衝突與危機問題。例如，美國在處理波灣危機、北韓核武危機、柬埔寨與中東地區問題時均是採

行此一模式，以維持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政治新秩序。此即國際政治學者奈伊 (Joseph S. Nye, Jr.) 所稱的「合作的權力」(co-optive power)。(註九)

第四、獨強也採行前述模式介入體系內成員國的內政與外交政策。例如，美國在前蘇聯政變期間即協同西方其他國家進行干預，在前蘇聯瓦解前也干預其民主改革方向與外交政策。(註十)此外，美國也正在協同其他國家介入中共的內政與外交事務。(註十一)

第五、獨強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出現本質上的變化，而導致「位階」的轉變。例如，前美國駐中共大使李潔明就曾指出華盛頓與北京關係已出現本質上的變化。事實上，此一情形也不只中共獨然，而是具有普遍性。(註十二)

第六、裁軍不僅限於戰略與戰術核子武器，也擴大到傳統武力。值得一提的是，對於若干前共產國家而言，裁軍已成為換取西方國家援助的籌碼。(註十三)

第七、獨強協同主要盟國主導全球事務議程的設定。全球事務議程則除了傳統的裁軍、防止核武擴散、安全合作、區域衝突解決與經濟、貿易合作之外，也列進諸如防止毒品走私、防治污染、環境保護、醫學合作

等新的議題。

第八、傳統的全球性角色正面功能日益彰顯，但同時也成為美國全球外交政策的工具。例如，美國在處理波灣危機、柬埔寨與中東地區等問題時，不是透過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案，就是要求聯合國派遣人員監督。

第九、獨強協同主要盟國選擇性地允許意識形態被擊敗的對手進入西方為主的國際經濟體系。例如，美國協同其他六大工業國家允許波蘭、匈牙利等進入「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會」，但僅允許前蘇聯以「特別準會員」的身分加入「國際貨幣基金會」，直到蘇聯崩解後才同意俄羅斯共和國加入「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會」。(註十四)

第十、獨強協同盟國選擇性地允諾協助意識形態被擊敗的對手進行經濟結構的改革。例如，美國與盟國允諾協助大多數東歐國家進行經濟改革，但對前蘇聯的援助則始終舉棋不定，(註十五)直到蘇聯瓦解後才認真考慮在國際合作的基礎上選擇性地對前蘇聯各共和國的經濟改革提供協助。

第十一、獨強鼓勵甚至促進各地區進行更大的經濟合作或整合，但反對任何排除美國參與的經濟、政治與

軍事整合。例如，美國反對解散此約，也不支持歐洲自行建立一支排除美國在外的歐洲聯軍。在亞洲，美國反對馬來西亞所提出的「東亞經濟會議」(East Asian Economic Caucus)並拉攏日本、南韓抵制該項組合，而全力支持「亞太經濟合作體」(Asian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第十二、國際經貿體系因東方集團的解體，而不再存在所謂的東西方關係。至於西方「既合作又競爭」的經貿關係，仍將持續一段時間。另外，由於「南方」一些國家，特別是部分中南美國家因從事經濟改革略有成就，也使南北關係有了新的轉機。

第十三、經貿科技掛帥時代正式來臨，但政治、軍事的力量仍不可忽視。例如有「經濟超強」之稱的日本與有「歐洲經濟發展火車頭」之稱的德國由於在國際上經貿地位與政治、軍事地位之間的落差甚大，仍無法與美國等量齊觀。(註十六)

### 美國在「單極為主多極政經體系」中的新挑戰

儘管在「單極為主多極體系」中，美國以獨強姿態

出現，正如布希總統所說「美國目前在世界上享無可爭辯與受尊敬的領導地位」，（註十七）但美國仍面臨若干挑戰，包括：

(1) 蘇聯瓦解之後，核子武器的控制權雖暫時掌握在俄羅斯共和國手中，但有一些核子武器與核武專家可能已經外流，整個世界仍未擺脫核子冬天的陰影。

(2) 第三世界一些國家正積極發展核武與化武，以及攜帶這些武器的載具或發射器，例如北韓、伊拉克、巴基斯坦等。

(3) 前蘇聯各共和國與東歐國家的經濟與政治改革仍面對重重困難，美國與其他西方即國家即使伸出援手，能否紓危解困不無疑問。

(4) 除日本外，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西方國家幾乎均陷入經貿困境，能否振衰起弊仍是一個未知數。

(5) 全球塊狀經濟整合正在形成中，惟美、歐、亞三大洲的整合速度與幅度差距頗大，不免影響三大經濟體的合作意願，若無法在烏拉圭回合談判與其他談判達成共識，建立遊戲規則與國際經貿新秩序，目前西方「既合作又競爭」的經貿關係也可能由量變而質變，出現惡性競爭，甚至導致貿易戰爭。

(6) 亞洲太平洋地區除了北韓之外，至少還有中共、緬甸是本區的不穩定根據。另外，在南亞的印度也具有威脅四鄰的潛力。

(7) 民主的力量在「非常鬆弛兩極體系」期間的後期曾一度蔚為潮流，但顯然並沒有繼續擴散，在有些國家非但無法生根，甚至還出現倒退的現象，如菲律賓、巴基斯坦等。

(8) 毒品走私、環境污染、致命疾病已成為威脅人類生存的新問題。

(9) 日本與德國若能與美國持續合作，將是國際政經新秩序賴以維持的最大保證。不過美國欲提升日、德兩國的國際地位，而又不致產生其他太大的副作用，顯然並非易事。

## 結 論

面對這些在「單極為主多極體系」中的諸多挑戰，身為獨強的美國若不能妥為因應、善加處理，以上這些挑戰也可能成為促使此一體系進一步轉化的因素或變項。

## 註釋

- 註一：有關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討論，本文主要根據 Morton A. Kaplan, "Variants on Six Model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James N. 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9, pp. 291-303; and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Wiley, 1957 與 Joan Edelman Spero,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4th edi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二人著作而略加變化。
- 註二：「單極為主多極體系」此一名詞，首先由 Samuel P. Huntington 教授提出，見 "America's Changing Strategic Interests," *Survival*, Vol. XXXIII,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1, p. 6 不過，Huntington 教授並未對此一體系的各種規則與變項多作討論。
- 註三：本文作者感於「鬆弛兩極體系」不足於說明 1945-1975 的國際政經體系，而提出混合國際政經體系的概念。
- 註四：見註一，Kaplan 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基本規則」主要是針對前述的三種國際體系。
- 註五：有關各種變項的討論，見註一，Kaplan 的著作。
- 註六：有關「轉化規則」的討論，見註一，Kaplan 的著作。
- 註七：見 Kaplan, "Variants on Six Model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pp. 300-301.
- 註八：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Harper Row, Publishers, 1990, pp. 437-448.
- 註九：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90, pp. 31-33, 188 & 191-95. 一個國家推動一種情況使他國根據該國偏好而採取一致行動的能力，此種「權力」的概念稱作「合作的權力」(the co-optive power)。
- 註十：陳一新，「美蘇關係從量變而質變的調整」，美國月刊，第六卷第十二期，民國八十年十二月，頁十七～二十六。
- 註十一：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變後，美對中共政策即逐步調整。一九九一年底至一九九二年一月初布希總統亞洲之行訪問澳、星、韓、日，此一跡象更為明顯。見陳一新，「貝克嚴厲口氣掩蓋朝覲之譏」，

聯合報，民國八十年十一月十日，頁九；「美不會在台灣問題對中共讓步」，聯合報，民國八十年十二月八日，頁二。

註十二：聯合報，民國八十年十二月七日，頁一。

註十三：陳一新，「歐洲裁軍條約奠定新秩序」，聯合報，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頁十一；「新興核武國家可能引爆新威脅」，聯合報，民國八十年九月三十日，頁十一。

註十四：見註十。

註十五：同註十四。

註十六：見註二Huntington, p. 6與註九Nye, p. 33.

註十七：China News, January 15, 1992, p. 1.

### 參考書目

1. Dougherth, James E. and Robert L. Pfaltzgraf,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3rd edition, 1990.
2. Huntington, Samuel P., "America's Changing Strategic Interests," *Survival*, Vol. XXXIII,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1.

3. Kaplan, Morton A., "Variants on Six Model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James N. 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9.

4. Keohane, Robert O.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5. Keohane, Robert 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9.

6. Nixon, Richard, *1999 Victory Without War*,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89.

7. Nye, Jr., Joseph S., *Bound To Lead*,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90.

8. 陳一新，「布希想不宣而戰總有方法達到目的」，聯合報，民國八十年一月十二日，頁四。

9. 陳一新，「歐洲裁軍條約奠定新秩序」，聯合報，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頁十一。

10. 陳一新，「美蘇關係未來發展充滿不確定性」，聯

- 合報，民國八十年三月二十一日，頁二。
11. 陳一新，「新興裁武國家可能引爆新威脅」，聯合報，民國八十年九月三十日，頁十一。
12. 陳一新，「貝克嚴厲口氣掩蓋朝覲之譏」，聯合報，民國八十年十一月十日，頁九。
13. 陳一新，「美不會在台灣問題對中共讓步」，聯合報，民國八十年十二月八日，頁二。
14. 陳一新編著，從台北看全球新秩序，民主叢書，台北；財團法人民文教基金會，民國八十年。
15. 陳一新，「美蘇關係從量變而質變的調整」，美國月刊，第六卷第十二期，民國八十年十二月，頁十七～二十六。